

名家主张，国学津梁，使你置身于博大精微之中，获致心灵的文化滋养。

清代学术概论

梁启超

国学名家选粹

以实学代虚学，以动学代静学，以活学代死学，与最近教育新思潮最相合。但所谓实，所谓动，所谓活者，究竟能免于虚静与死否耶？此则时代为之，未可以今日社会情状绳古人矣。

中国书籍出版社

名家主张，国学津梁，使你置身于博大精微之中，获致心灵的文化滋养。



国学名家选粹

词之为学，意内言外。发始于唐，滋衍于五代，而造极于两宋。调有定格，字有定音，实为乐府之遗，故曰「诗余」。

清代学术概论

梁启超

中国书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清代学术概论/梁启超著. —北京:中国书籍出版社,2006.5

ISBN 7-5068-1430-7

I. 清… II. 梁… III. 学术思想—思想史—概论—中国—清代 IV. B2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42150 号

策 划:刘伟见 王俊

责任编辑:刘兰肖 王 俊

责任印制:熊力 武雅彬

封面设计:山羽艺术

出版发行:中国书籍出版社

地 址: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(邮编:100073)

电 话:(010)51259192(总编室) (010)51259186(发行部)

电子邮箱:chinabp@vip.sina.com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:6 印张

字 数:59 千字

版 次: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00001-10000 册

定 价:16.00 元

序 言

王生平

上世纪末出现的“国学热”，热了不久即被“西学热”冲淡，正如在此之前的“美学热”很快被“文化热”所取代一样。转型时代的“车轮”转得如此之快，令人眼花缭乱、目不暇接。就“国学”而言，回首一瞥上世纪初叶辛亥前后情景，恍如昨日，何其相似乃尔。那时有《国粹学报》，今日有《国学季刊》；那时出“国学”丛书，今日有大规模“儒藏”编纂工程；那时有“国学大师”，今日“大师”更多；那时有《拟设国粹学堂启》的设想，今日有“孔子研究院”、“国学班”的建立，甚至沉寂几十年的私塾也星星点点地萌发出来；那时有“20 世纪，为中国古学复兴的时代，岂不盛乎”的渴望，今日有“民族文化复兴”的期待。尽管从辛亥到 21 世纪初，人们经历了





“打倒孔家店”的“五四”洗礼和文革横扫“四旧”和随后而来的“评法批儒”运动，但“国学”不但没有消逝，反而以“热”的形式姗姗而来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时间说明一切，此情此景难免引发人们“未见池塘春草绿，门前梧桐已秋声”的深沉感慨。确实，百年虽历史一瞬，但毕竟是几代人的历程，尤其近20年来的巨变，已赋予了“国学”以新的内容、形式。

首先，“国学”这个概念，已经从古典走向近、现代，她不再是那么含混笼统的“国家固有学术、文化”，而是文史哲各有特征的分科。

其次，“国学”不仅不以儒家马首为瞻，不排斥反而与道、释等各家有互补关系。于是就有“儒治世、佛治心、道治身”的分工又合作状态。华夏文化对内如此，对外也如此，表现为近现代有识之士能主动与异质文化交流而相得益彰。西方科学史之父乔治·萨顿说：“光明从东方来，规则从西方来”。英国李约瑟博士认为：“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像中国的孔庙具有神圣化的意义，但孔夫子却从来不谈‘鬼

神’”。王国维、蔡元培各自汲取了叔本华、康德的哲学和美学，结合礼乐传统文化，提出了“以美育代宗教”的新命题，为补充教育方针的“美育”奠定了理论基础。“美育”终于于前几年被正式纳入教育方针之中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学界还提出了“文化中国”概念，受到了界内外人们的瞩目。她不是地理或政治概念，而是文化概念，主要指对中国文化的心理认同和认同心理。人们之所以认同这个概念，不是随心所欲的主观刻意为之，而是正确概括、科学提炼的历史经验。从秦汉到明清两千多年，汉民族以其文化而非暴力同化其他少数民族，是主流。包括“五胡乱华”、“满族入主”，其结果最终由被统治者、被压迫者的汉族同化了统治者、压迫者，竟可以使他们失去原有的语言文化等。所以，中国、中国人不是种族观念，而是文化观念。“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所征服的民族较高文明所征服，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”。（马克思）

“十全十美是天上的尺度，达到十全十美的愿望





是人类的尺度”，歌德说道。即使面对历史如此悠久，地域如此辽阔，人口如此众多，文化如此统一的中国也当作如是观，圣人的宏大理想和落实在生活中的结果总是有很大的剪刀差。常见的是，同一事物中既有长处又有缺欠，“此事古难全”。这从汉代阴阳五行组成的天人反馈系统落实在人对社会中的“秩序性”的取向上可看出来。一方面带来所谓安分守己，听天由命，“思不出位”，逆来顺受；另一方面又教育人们做事做人要注意整体和全局，不走极端，从而可以在系统中获得归属感。长处和弱点，优点与缺陷，本就难以分割地连在一起。正因为如此，孔子才提倡根据具体情况进行“损益”：增之一分则太长，减之一分则太短。要求“把握分寸，恰到好处”。这也是“过犹不及”的“中庸”，也即是“度”。但实际上往往做不到，就需要批评或批判来校正。这就是后人总结概括的批判，继承，批判地继承；解构，重构，解构再重构等模式所由来。杨振宁教授曾批评传统文化阻碍了中国数学的发展，我认为有一定道理。确实，中国人

在各种事务中惯于深思熟虑，周详细密地计量估算，注意实际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逻辑，不冲动，不狂热。然而同时就束缚、压抑了浪漫想象的自由开展、逻辑形式的纯粹提炼和抽象思辨的充分发展。在理性形式和思维能力处处套上了不离日常生活经验的框架，阻碍了它的新开拓。无怪乎孔子说：“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”。按照这一标尺，不就把杨振宁问题的价值突出表现了出来吗？！“不知”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以不知为知。前者是动力的催化剂，后者是无能的遮羞布。正是从这里出发，沿着“知之者不如好之者，好之者不如乐之者”这一路径，华夏文化不因无人格神的上帝而悲观，而是在此情境下建立乐观宇宙观，以为支持，以求上进，日新又日新。因此之故，在本尼迪克特这位人类学家划出“罪感文化”、“耻感文化”这两类文化类型之后，我国学者把华夏文化特质概括为不同于“罪感文化”、“耻感文化”的“乐感文化”：中国人很少彻底的悲观主义，而总愿意乐观地眺望未来，即使是处在极为困难的环

境里，他们也相信有一天“否极泰来”，因为这是符合天道的。

中国书籍出版社策划出版“国学名家选粹丛书”，希冀多层次、多侧面、多角度、多途径、多问题、多要求、多方法展开了乐感文化的表、里、内、外，把握华夏文化的灵魂，把无意识意识化，并进行转化性的创造，为使中国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，实现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尽绵薄之力。我完全同意并赞成这个意向，是为此序。

（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

哲学所研究员，《哲学研究》副主编）

蒋 序

方震编《欧洲文艺复兴史》既竣，乃征序于新会。而新会之序，量与原书埒，则别为《清学概论》，而复征序于震。震惟由复古而得解放，由主观之演绎进而为客观之归纳，清学之精神，与欧洲之文艺复兴，实有同调者焉。虽然，物质之进步，迟迟至今日，虽当世士夫大声以倡科学，而迄今乃未有成者，何也？

且吾于清学发达之历史中亦有数疑问：

一、耶稣会挟其科学东来，适当明清之际，其注意尤在君主及上流人，明之后，清之帝皆是也。清祖康熙，尤喜其算，测地量天，浸浸乎用之实地矣。循是以发达，则欧学自能逐渐输入，顾何以康熙以后，截然中辍，仅余天算，以维残垒？

二、致用之学，自亭林以迄颜、李，当时几成学者风尚。夫致用云者，实际于民生有利之谓也。循是以往，亦物质发达之门，顾何以方向转入于经典考据



者则大盛，而其余独不发达，至高者勉为附庸而已？

三、东原理欲之说震古砾今，此真文艺复兴时代个人享乐之精神也。“遏欲之害，甚于防川”，兹言而在中国，岂非奇创？顾此说独为当时所略视，不惟无赞成者，且并反对之声而不扬，又何故？

四、迨至近世，震于船坚炮利，乃设制造局，译西书，送学生，振振乎有发达之势矣。顾今文学之运动，距制造局之创设，后二十余年，何以通西文者，无一人能参加此运动？而变法维新、立宪革命之说起，则天下翕然从之，夺格致化学之席，而纯正科学卒不扬？

此其原因，有原于政治之趋势者。清以异族入主中夏，致用之学，必遭时忌，故藉朴学以自保，此其一也。康熙末年，诸王相竞，耶稣会党太子，喇吗党雍正（此言夏穗卿先生为我言之），既失败于外，又遭谗于罗马，而传教一事乃竟为西学输入之一障害，此其二也。有原于社会之风尚者，民族富于调和性，故欧洲之复古为冲突的，而清代之复古，虽抨击宋学，

而凭圣经以自保，则一变为继承的，而转入于调和，轮廓不明瞭，此科学之大障也，此其三。民族尚谈玄，艺术一途，社会上等诸匠人，而谈空说有者，转足以自尊，此其四。今时局机运稍稍变矣，天下方竞言文化事业，而社会之风尚，犹有足以为学术之大障者，则受外界经济之影响，实利主义兴，多金为上，位尊次之，而对于学者之态度，则含有迂远不适用之意味，而一方则谈玄之风犹未变。民治也，社会也，与变法维新、立宪革命等是一名词耳。有以异乎？无以异乎？此则愿当世君子有以力矫之矣。

民国十年正月二日

蒋方震

自序

(一) 吾著此篇之动机有二：其一，胡适语我：晚清“今文学运动”，于思想界影响至大，吾子实躬与其役者，宜有以纪之。其二，蒋方震著《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》新成，索余序，吾觉泛泛为一序，无以益其善美，计不如取吾史中类似之时代相印证焉，庶可以校彼我之短长而自淬厉也。乃与约，作此文以代序。既而下笔不能自休，遂成数万言，篇幅几与原书埒。天下古今，固无此等序文，脱稿后，只得对于蒋书宣告独立矣。

(二) 余于十八年前，尝著《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》，刊于《新民丛报》，其第八篇论清代学术，章末结论云：

此二百余年总可命为中国之“文艺复兴时代”；特其兴也，渐而非顿耳。然固俨然若一有机体之发达，至今日而葱葱郁郁，有方春之气焉。



吾于我思想界之前途，抱无穷希望也。

又云：

有清学者，以实事求是为学鹄，饶有科学的精神，而更辅以分业的组织。

又云：

有清二百余年之学术，实取前此二千余年之学术，倒卷而继演之，如剥春笋，愈剥而愈近里；如啖甘蔗，愈啖而愈有味：不可谓非一奇异之现象也。此现象谁造之？曰：社会周遭种种因缘造之。

余今日之根本观念，与十八年前无大异同。惟局部的观察，今视昔似较为精密。且当时多有为而发之言，其结论往往流于偏至。——故今全行改作，采旧文者什一二而已。

（三）有清一代学术，可纪者不少，其卓然成一潮流，带有时代运动的色彩者，在前半期为“考证学”，在后半期为“今文学”，而今文学又实从考证学衍生而来。故本篇所记述，以此两潮流为主，其他则



附庸耳。

（四）“今文学”之运动，鄙人实为其一员，不容不叙及。本篇纯以超然客观之精神论列之，即以现在执笔之另一梁启超，批评三十年来史料上之梁启超也。其批评正当与否，吾不敢知。吾惟对于史料上之梁启超力求忠实，亦如对于史料上之他人之力求忠实而已矣。

（五）篇中对于平生所极崇拜之先辈，与夫极尊敬之师友，皆直书其名，不用别号，从质家言，冀省读者脑力而已。

（六）自属稿至脱稿，费十五日，稿成即以寄《改造杂志》应期出版，更无余裕复勘，舛漏当甚多，惟读者教之。

民国九年十月十四日 启超识



第二自序

(一) 此书成后，友人中先读其原稿者数辈，而蒋方震、林志钧、胡适三君，各有所是正，乃采其说增加三节，改正数十处。三君之说，不复具引。非敢掠美，为行文避枝蔓而已。丁敬礼所谓“后世谁相知定吾文者耶”；谨记此以志谢三君。

(二) 久抱著《中国学术史》之志，迁延未成。此书既脱稿，诸朋好益相督责，谓当将清代以前学术一并论述，庶可为向学之士省精力，亦可唤起学问上兴味也。于是决意为之，分为五部：其一，先秦学术；其二，两汉六朝经学及魏晋玄学；其三，隋唐佛学；其四，宋明理学；其五，则清学也。今所从事者则佛学之部，名曰《中国佛学史》，草创正半。欲以一年内成此五部，能否未敢知，勉自策厉而已。故此书遂题为《中国学术史第五种》。

(三) 本书属稿之始，本为他书作序，非独立著一书

也,故其体例不自惬者甚多。既已成编,即复急于改作,故不名曰《清代学术史》,而名曰《清代学术概论》,因著史不能若是之简陋也。五部完成后,当更改之耳。

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启超记